

每个被捕捉的瞬间都会传递中国姿态

□ 赵迎新(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, 2008年北京奥运会摄影运营官)

Cindy(我的英文名字),这是一份艰难的工作,你要作好准备。2005年,我被聘为北京奥运会的摄影运营官,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总监安东尼第一次见面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。
在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中,媒体运行部门通过向采访媒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管理,让媒体最大限度地传播赛事组织和活动的影响。奥运会摄影运营官的职责,就是与全球媒体打交道,帮助他们做好奥运会的报道工作。从之前更多是单枪匹马工作的摄影记者,到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摄影运营官,我对中国的对外传播也有了更多深切体会。

记得最初担任这一职位时,我内心还会嘀咕:投入3年多的时间去从事这样一个服务行业,值得吗?当时,我们的工作内容是复杂而琐碎的,要帮全球各大媒体对好一个个摄影位置,确认好一根根传输线路,安排好一个个办公地点。其间,还要经历数百场会议和无数次汇报。那时候,常常一天从早忙到晚,从一个场馆跑到另一个场馆,电话就没停过。
可是,当奥运会正式开幕,我们看到一个一个长枪短炮各就各位、启动拍摄,各国主流媒体将海量现场影像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时候,我才真正意识到了媒体运行所产生的巨大传播作用。当时,很多媒体都有个习惯,就是在他们办公区门口的墙上贴上自己当天的报道。从开幕式到闭幕式,各大媒体的办公室外墙上都贴满了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,有照片,有报纸的版样,也有杂志的封面。

看到近千家全球媒体捕捉的精彩瞬间,我认识到:自己从事的工作不仅具有单纯的服务功能,而是承担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组织传播功能,能够让全世界的民众通过各国主流媒体的报道,看到奥运会的动人时刻、看到各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,看到中国昂扬、自信、开放的态度。通过这个平台,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,中国声音和中国精神也被全球更多人听到、感受到。
由此可以看出,作为组织传播的一种形式,媒体运行是一种有制度、有计划、有一定规模的信息交流活动。它的特点是:某一组织的决策实施过程,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传播过程。媒体运行作为北京奥运会运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以组织传播的方式,在微观层面承担着向媒体提供服务的功能,主要任务是协调奥运会承

办组织与媒体之间的关系。
在宏观层面上,媒体运行可以帮助树立奥运会的形象,承担着推动中国对外形象传播的功能。通过对媒体的服务,可以在全世界树立中国开放、进取、经济蓬勃发展、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总体形象。
正如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所说:一届奥运会是否成功,媒体是最终的裁判。媒体运行的质量,直接影响着全球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组织者的评价,影响着中国声音的传播效果。
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出身的媒体出版传播者,我一直相信“一图胜千言”所带来的穿透性效果,相信影像在现代传播中所承载的重要社会角色。不过,一位德国摄影师的偶然交谈也让我对国际传播有了更多思考。
当时,我们邀请一些国外著名摄影师

来华拍摄中国的世界遗产。看到我们展示的很多中国摄影师拍摄的图片时,这位德国摄影师说道:这些作品很精彩,可是在德国的主流媒体和平台上,自己能接触到这类作品的机会比较少。他表示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印象十分深刻。他回忆道:当时自己看了德国国家电视台的转播节目和德国媒体的相关报道,开幕式中击缶等表演十分具有冲击力。
这段看似简单的对话,对我来说是一种提醒:我们在进行中国对外传播和国际交流时,除了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,或许还要注意很多传播上的问题,比如这些好故事应该由谁来传播,传播者的信誉和权威如何,在什么平台传播,用什么语境传播,传递给谁,内容适合单向传播还是双向传播,传播者和受众是否能产生共鸣等。
我想,在这些层面进一步发力,能够让对外传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,让好故事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力。而在这个过程中,应该更加注重媒体运行的重要作用,让其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和赢得国际声誉的助推器。

深度媒介化时代,构建立体丰满的中国形象



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

联合国工作中,我多次与中国立场同框

□ 范纹嘉

2018年6月1日,作为生态环境部第一批到联合国环境署派选的11名青年项目官员(JPO)中的一分子,我来到了日内瓦。新外交的发祥地,开启了我的环境外交之旅。过去4年,我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推动政府间谈判和协商处理国际环境关系,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、协议或无法律约束力的宣言、行动计划或指南,推动成员国采取共同行动,解决全球、区域和各国环境问题,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回想过去,初来乍到,我担任了联合国环境署经济司化学品处处长助理。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,这个角色没有给我任何一个新人的适应阶段。报道第一天,我就被拉去参加了由十多个国际机构各司局一把手参加的“国际化学品战略管理方针新出现的政策问题及其他关切问题”高级别会议。接下来的3个月里,我作为处长的“小尾巴”,穿梭于各大线上、线下会议,忙着聆听各利益相关方的观点,协调多方时间与内容,了解各议题的进展以及面临的挑战,从而收集各方表述,整理成报告。不得不承认,这3个月的教训,让我和许许多多化学品议题有了亲密接触,为后续深入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几个月后,我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任

务,其中就包括负责推动“含铅涂料”议题。铅会对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造成危害,尤其是对于儿童和工人而言,含铅涂料是重要接触源。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,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实施了严格限制装饰涂料中铅含量的法律或法规,并对其他含铅涂料和涂层产品实施管制,但截至2018年,全球层面仍有约70%的国家未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措施。因此,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起,根据科学数据、案例编制为规范指南及示范法,呼吁各国推动立法禁止制造、分销、销售和进口含铅涂料,也针对民众开展了密集的宣传,从而降低含铅涂料带来的严重健康危害。
此外,我还负责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多边环境公约履约能力建设问题,通过了解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在履行《巴塞尔公约》《鹿特丹公约》《斯德哥尔摩公约》(以下简称“三公约”)以及《水保公约》中的挑战,寻找共性问题,为其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。这个角色也让我有机会站在中立的秘书处角度,多次支持“三公约”及《水保公约》缔约方大会的胜利召开,也多次在这一场景下与中国立场同框。
这几年里,我走过了很多地方,遇到了很多人,经历了很多事。我无法忘记,在肯尼亚人如潮汹涌且混杂着汗臭的拥挤小巷中,一个满脸油漆点儿的男孩站在堆积如山、五颜六色的油漆桶旁,抖着浸泡在油漆涂料中的小手,朝我微笑的样子,也难以忘

记,我们一行人问他是否了解他的操作过程中所面临健康风险时,他迷茫地看着我们,然后大口喝下牛奶并告诉我们“牛奶可以去除藏在胸内的油漆污垢”时的样子。这味道、场景狠狠按压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,也让我深感肩上责任和使命的重量。
这几年里,我也与160多个国家、政府间国际组织、私营部门、非政府组织有过密切的沟通。难以忘记的是,各区域代表为了决议上一个措辞、一个时间点争辩得面红耳赤,也无法忘记,在我们的努力下,很多数字悄悄变化:比如,在196个国家中,已有36%的国家发布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铅涂料条例,而且签署并加入公约、倡议和活动的国家日益增多,共同推进化学品管理的全球化。
同时,我也见证了“中国环保人在推动多边环境公约履约过程中付出的努力。每一份政策建议的发布、每一次国际舞台的亮相,以及每一场能力建设活动中中国经验的分享,无不让我觉得祖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,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、打造绿色国际公共产品而努力。”
很多前辈在诸多场合,已经留下了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身影,我也有幸跻身其中。在我看来,传播交流是“聆听和分享”的双向奔赴。作为青年,我们应该用心聆听世界的声音,积极学习借鉴各国有益经验和成果,也应全方位、深层次了解世界,应用最新传播方式,讲述中国故事,参与全球治理,携手各国青年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当今世界,国家形象塑造已经上升为不可或缺的国际战略。人工智能时代,社交媒体、直播、VR、AR、弹幕类视频网站等平台,突破传统媒体的时空限制,建构起虚拟的互动场景,如何通过声音、文字、图像等多种形态(即多模态)来传播国家形象,助其立体与丰满?

陈昌凤(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、教授)我们的媒介化发展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,而且进化得越来越快。过去通常说是用技术来界定媒介发展,但是深度媒介化的当今,我们可能要改变思路,用媒介的功能来界定媒介的使用,而不是用技术的使用来确定媒介的功能。在这个背景下,做形象传播最重要的是如何去使用技术、使用媒介。
不久前,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花了几个月时间去体验虚拟VR的社交空间,并且用了24小时去做了一个采访,他认为在这个空间里面与各种各样的人相识交谈,不需要通过算法,它跳过了算法中介,可以让用户跟用户面对面,虽然彼此用的是化身,但这种用化身的方式去交流,用声音去交谈,用当时的情感进行交流,其实是对现实交流进行了深度还原,在亦真亦幻的空间里面,虚拟和物理现实同样重要。在这种语境中,国家形象如何传播、如何呈现,是需要我们快速去跟进的。总的来说,从情感到认知层面这种沉浸式,对于形象传播的影响和认知是颠覆式的,这种真实的却又在拟态环境中的交流,最核心的改变是什么?我认为,它最核心的是打造一种“去中介化”的传播。
新技术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,最重要的两个方面,一个是基础设施的问题,比方说元宇宙技术关涉到的网络、算力、支付、平台,以及那些无形的协议等等。第二点就是文化适应性问题。在文化滞后的情况下,我们如何把文化适应性、文化协调做好?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,将沉浸式看作是中中介化的,还是全中介化的?当抽象符号在去中介化的情况下变为具象的形象传播,又会如何变化?这其中就要考虑到国家界限的问题,去中介化的环境里面,界限遭到弱化,那么界限在哪儿,国家怎么展示?

蒋俏蕾(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、副教授)在当今被称为深度媒介化的时代,媒介如同基础设施一般,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我们所说的媒介生态环境,不仅是人们生活大环境的一部分,很多时候它甚至就是环境本身。媒介作为一种“酶”,正在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,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与挑战,也催生着机遇和创新,应用到国家形象传播的领域中,会带来多元的可能性。因此,以“酶”为媒的国家形象多模态传播,是全媒、全员和全科的。
所谓“全媒”,是指涉及现有的各种媒介技术、媒介形态,亦是分布式的、去中心化的,突破了以往主要由专业机构等为主体代表国家的传统叙事方式,更为多元的表达空间在当下和未来成为可能。比如,海内外社交媒体追捧的云南象群迁徙,以区别于传统宏大叙事的可爱形象,通过图片、视频方式等展现我国生态环境中的动物生活,有助于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相应的,也需要结合新的方式来测量国家形象的传播效果。比如我们近两年做了关于“萌”的研究,采用脑电的方式测量大众受众纷纷但普遍喜爱的“萌”到底是什么,带来怎样的效果与影响,通过认知传播的测量手段,直观地呈现出“萌”背后反映出来的人们丰富的情感维度,可见,多模态的传播能够调动起更加丰富的情绪体验。
所谓“全员”,是指参与到国家形象展示和传播过程的主体会更加多元。主流媒体、专业人士、意见领袖、企业平台、普通个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渠道展示国家形象。
所谓“全科”,是发挥传播学作为十字路口上的学科的特点,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,通过学科交叉融合,培养适合多模态传播模式的高素质、多元化、创造性人才,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。
(摘编自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国家形象的多模态传播研究 研讨会 整理:白毅鹏)

其次,学术传播兼具学术性影响,客观上又产生国际传播、战略传播所期望产生的深层影响,有着非常强烈的外溢效应,深刻影响人们对科学活动、科研成果及其相关研究团队、研究实体和国家的认知,对国家国际传播、国家形象的塑造非常有价值。
吴晔(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/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教授)从计算传播的角度,我想分享两个关于多模态传播的观点。
第一,发挥多模态的传播优势,让传播的内容更加“接地气”。比如,网剧就是更加“接地气”的产品。我们研究发现,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在海外大受欢迎,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打开了新局面。观众们不仅讨论剧情,甚至讨论剧中涉及的文化符号、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,如讨论故宫等,它优秀的配乐,能够烘托情节,也显示出了中华文化的美感。做国家形象传播,要借力多模态传播,注重内容为王,降低跨文化传播的壁垒,帮助更多跨文化受众快速地接受、喜爱我国文化。
第二,需要关注长尾理论,对细分受众进行精准传播,丰富对应的传播模式。比如,部分目标用户对科学活动更热爱,网络小说,我们就可以将网络小说改编的漫画,类似的内容推送给对应用户。又如,部分目标用户喜爱某个电视剧,我们就可以将其衍生的主题曲等不同模态的产品、衍生品推送给用户,也包括相应的文化背景、



让更多外国人看到新闻之外的中国

□ Steven Weathers(英语节目主持人、网络视频UP主)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钟的采访整理

1999年,我随旅行团第一次来到中国。当时,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少,美国民众也对中国的了解比较片面。而我的第一次来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,中国人都非常友善和热情。

只有亲身来到中国,学习中国的语言、风土人情,才能让自己更好地了解中国。2005年,我来到河南洛阳,边教英语边学习汉语。第二年,我搬到上海生活,被聘为上海师范大学的美籍教师。从那时起,我开始担任上海外语频道几个节目的主持人。有时候,我还在影视剧里扮演外国人角色,比如《蜗居》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《跨过鸭绿江》。为了录制节目,我几乎走遍了全中国。

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,我在一档名叫《世博360°》的电视节目担任出镜记者,几乎每天都在世博园里跑来跑去。我还参与制作了一部展示日本侵华的纪录片,曾在央视海外频道播出。很多美国人不了解日本的侵略史,学校老师也很少在课堂上提到。我想,自己有义务帮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。

在电视台工作快10年时,我发现人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,拥抱社交媒体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。通过成为视频UP主,我可以与更多粉丝互动交流。在网络节目里,我们不仅分享美食和风光,还致力去展示乡村中国。1999年,我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,附近农村的路都是土路。哪怕在2010年前后,很多农村地区的建设也并不完善。现在不过十来年,乡村面貌和村民生活方式发生巨变。洛阳并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,但我回去的时候,当地新区让我想起洛杉矶的比弗利山庄。

中国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,是很多人看不到的。前不久,我们前往江西婺源,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却很有超前意识。为了保护300年的古村落景观,当地把所有电线都埋入了地下,而不是到处都竖立着电线杆。我们还去黑龙江五常拍摄当地大米产业。当地政府不光重视稻米产出,也很注重保护自然环境,水稻产区周边没有任何工厂和化工设施。

我去海南拍节目的时候,不光去人尽皆知的海口和三亚,还前往陵水县。那里有很多渔民至今生活在渔排上,尽管海上生活有诸多不便,还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海水污染,但政府没有强制他们搬到陆地上。为了减少污染,当地建设了一套污水净化系统和垃圾收集系统。现在,渔民不仅能够延续传统生活方式,还能通过开海上餐厅等方式获得旅游收入。

很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。拿食物来说,美国人眼里的中餐很大程度上只是粤菜,因为最早到国外开餐馆的中国人大多是广东人,或者是香港人、福建人。因此,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后,他们经常为各地不同美食感到震惊。一些外国人看了我的节目,都想去探索那些从没听说过的小地方,而不是游客集中的风景名胜。

绝大多数美国人只能看到新闻里的中国,只有来到中国,才能更好地理解真实的中国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,每天都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旅行,我甚至听说每天有十多艘游轮在各地港口停靠。外国人哪怕只是在中国停留一天,也比之前道听途说获得的信息来得丰富。现在,很多外国人通过视频游览中国。不管通过什么方式,中国都有必要努力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开放。

在中国这么多年,我发现自己才是团队里的“中国人”,而90后、00后的中国同事已形成了国际化思维。在讨论选题的时候,我会从中国的角度思考问题,而他们可能恰恰相反。经常有人问我,什么时候回国生活?我说,这里太好玩了,我不想回去,中国就是我的家。

法国街头的古筝声里,流淌着鲜活的中国故事

□ 彭静旋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杨鑫宇采访整理

我是彭静旋,一名在法国留学、研习音乐文化的民乐人,不过,大家或许更熟悉我的网名“碰瓷彭碰瓷”。带着从小伴我长大的古筝,我曾在法国的街头演奏古意盎然的《渔舟唱晚》,也曾在瑞士的湖滨弹奏响气飘逸的《相思风雨中》。在不用买票也没有座席的街头音乐厅,不论是相传为伯牙所作的《高山流水》,还是周杰伦的《Mojito》,形形色色、风格迥异的曲目,都可能出现在我的“节目单”中。一弦一柱之间,不同的弹奏方式,可以演绎出古筝的千百种魅力。我也很高兴能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传播古筝承载的中国文化。

多年以前,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,父母让我挑选一件想学的乐器。走进琴行,我第一眼就看中了古筝。与古筝为伴的日子越久,我便越能领会到它在2000多年历史中积淀出的独特气韵。为了在交

流中打开眼界,加深自己对音乐的理解,我考入法国波尔多国立第三大学,在2018年踏上了欧洲的大地。
相比于每天都要高强度练琴的本科时代,我在法国修读的硕士专业更偏重理论。但是,稍有一阵子不碰古筝,我就感到手痒起来。就像离开家乡之后,我更想念中国的种种一样。在波尔多,我发现大剧院前的广场上常常有人开展街头表演,其中不乏高水平专业人士,我加入了这个行列,由此开启了一段始料未及的美好旅程。
第一次演奏,因为没有什么期待,我一点也不紧张。直到弹完好几首曲子,我才抬起头来,好奇的听众已经围成了一个圈。听曲子时,他们站得很远,但一等我弹完,便立刻有好几个人凑上前来,问我弹奏的乐器叫什么名字、有多少年的历史、来自哪个国家。
能被这么多观众肯定,我当然很开心,但我也很惊讶,原来普通外国人对古筝的了解这么少。这3个月的见闻,让我参与了许多多化学品议题有了亲密接触,为后续深入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几个月后,我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任

告诉我,古筝这么好的东西,很多外国人竟然一点都不知道,心底的声音告诉我,要把街头演奏这件事做下去,用琴声让更多人切身体会到古筝的魅力。
在国内读大学时,我虽然学的是民乐,但在课程体系里,我们都会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、音乐史。国人对钢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等常见的西洋乐器也是耳熟能详,很多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去上学。但是在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,了解东方音乐、东方乐器的人寥寥无几,音乐学院里也不会教多少与此相关的知识,这让我觉得很可惜。
如果能让更多中国音乐文化为外国所知,不仅是在传播中国文化,也能给外国的音乐人和普通听众带来更多灵感和选择。交流与创新,可以让文化焕发出更蓬勃的生命力。很多的民乐创新,都是从音乐剧、电子乐等外来元素中得到灵感。我也希望有朝一日,全世界的音乐人都能了解中国的古筝,把古筝作为一种元素,融入他们的音乐中,让古筝像萨克斯一样,成为全球所有都不陌生、都愿意欣赏的世界乐器。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出一分

力,我的演奏便有意义。
说来也巧,让我在法国街头弹古筝这件事火起来的,是一个路过波尔多的中国游客。他在海外听到自己熟悉的音色曲调,非常惊喜。这个视频火了之后,我自己的账号才有了更多关注者,我也因此更加注重在网上记录街头演奏中的点点滴滴。
最近几年,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,很多人都在谈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。我想,音乐是很好的讲述载体,它不需要翻译也没有门槛。当我在法国的街头弹起古筝,琴声之间流淌的正是一个个鲜活的中国故事。这些故事的气韵绝非一成不变,也没有特定的主题,古筝的不同流派、不同音色千姿百态,能让人看到中华文明的宽广与包容。有时,我会演奏温婉的潮州筝曲,让人联想到中国画里的小桥流水;有时,我会演奏大开大合的陕西筝曲,让人仿佛在秦腔声中看到黄土高坡;还有一些时候,我会演奏西方的流行乐曲,让外国听众发现,原来中国故事和他们的距离也可以很近。
古筝是包容的,没有局限,中国故事亦如此。